

62

天津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五十四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
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怀念著名水产专家郑恩绶·····	郝生德(1)
著名教育家潘承孝教授·····	王家琦(10)
刘锡瑛生平记略·····	潘承孝 杜碧涛(31)
张伯苓先生与南开·····	王文田(39)
天津建市前后地方税收史话(二)·····	孙慎言(62)
中国三大名醋之一——独流老醋·····	刘振勇(94)
杨村糕干·····	杜 靖(96)
天津冬菜小史·····	江 镜(98)
宝坻大蒜·····	吴 影(100)
董守义与天津篮球运动·····	李清安 王锡良(103)
泳坛泰斗穆成宽·····	杨柏泉 穆瑞龙(107)
天津排球运动发展简史·····	张亦诚 郑必达(124)
河东——足球之乡·····	袁家宾(151)
质疑·订正·补充	
对《天津同和兴货栈》一文的 更正与补充·····	李捷三(170)

小资料

黑白女子篮球队 林秀莲 靳淑基 (9)

刘起的“枕头素卷圈” 李伯谥 (123)

怀念著名水产专家郑恩绶

郝 生 德

岁月流逝，光阴荏苒，我国著名水产专家郑恩绶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。我与郑老共事多年，想起往事，感慨万千，仅将他一生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、发展我国水产事业的业绩，作一追述，以示怀念。

(一)

郑恩绶生于1897年，祖籍天津，他出身贫寒，世代以作塾师为生。郑恩绶小学毕业后，因无力继续求学，遂考入李鸿章创办的半工半读的水产职业学校。他学习刻苦，成绩优良，进取心强，干起事来不屈不挠。有一年，水产职业学校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，郑恩绶本符合条件，却因微妙的人事关系未中选。郑恩绶很不服气，仍尽力争取。后来，主其事者发现他水产专业知识很扎实，业务能力亦很强，遂重新复试，合格被录取，乃于1917年东渡日本，就读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科。

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，中国留学生备受日本人的歧视，处境艰难。但他学习积极努力，又天生不晕船，留学期间，日本帝国大学组织学生到欧美各国进行海上实习，同去的

很多学生不适应海上生活，而他能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作业，学以致用，出色地完成了实习任务，博得各方面的好评，既为祖国争了光，也扭转了某些日本人的偏见，日本同学对他非常钦佩，有的与郑恩绥成了知心朋友，直到1922年他毕业回国后，仍有人写信，或来津问候，与他共同探讨，切磋水产问题。

郑恩绥在日本学了5年水产专业，更增加了对水产科学的兴趣，坚定了振兴中华水产事业的信心和决心。他看到中国江海水域辽阔，发展水产事业大有可为，但和日本相比，捕捞技术十分落后，设备极其短缺，于是他费尽千辛万苦，搞到一条渔轮，驾驶回国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郑老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。天津沦陷后，有些日本人素知他在水产方面造诣颇深，便纷纷邀他出山，他都予以拒绝，他说：“宁肯挨饿，也不替日本人干事。”他平日并无积蓄，不工作，全家数口生活便无以维持，他一人挨饿，全家也都跟着挨饿。他的两个孩子，每天早晨上学，各带一个窝头，但到了学校，一想到全家都没吃的，不忍心吃下去，放学后又把窝头原封不动地带回家。最后，全家几近断炊，确实维持不下去了，郑恩绥便到渤海中学去作生物教师。当时物价飞涨，米珠薪桂，但中学教员收入菲薄，依然解决不了全家吃饭的问题，还得东挪西借，典卖衣物，经常把衣服、首饰送到河北大街、东南角的当铺典当。由于每天都得筹划、安排生活，因此有时上课迟到，校方以影响教学为由，将其辞退，以后他又到新学中学担任生物教师，这样勉强支撑到抗战胜利。

日本投降后，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贪污腐化，更是深恶痛绝。他同情革命，保护进步学生，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，

支持解放战争。

1948至1949年初，河北水产专科学校的任树元（国民党特务，解放后被处决）得悉学生会委员朱宝良经常张贴进步标语，宣传革命胜利前景，遂决定将朱开除。当时郑恩绶任教务处主任，他马上向任树元提出抗议，并说：“开除学生是教务处的事情，你无权处理。”为此两人争吵起来。最后，郑恩绶表示：“如果开除朱宝良，我就辞职！”并立即写了辞职书，此举震动了全校，后经校务会议反复研究，终于撤销了开除朱宝良的决定。

1948年，为迎接天津的解放，我地下工作人员在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内外，大力宣传党的政策，经人告密，任树元曾多次策划逮捕，均遭郑恩绶拒绝。任遂暗中派特务在某天半夜秘密抓捕了十几名参加地工的学生，一时间校内一片混乱，教学工作无法进行，被迫停课4天。对此，郑在教务会上提出两条意见：1.对任树元的非法行动，要求校方追查责任。2.由学校出面，保释被捕学生回校上课。经过反复较量，最后由校长张元第和郑恩绶出面向特务机关交涉，将十几名被捕学生保释回校。

解放前，郑恩绶经常去安新白洋淀一带作渔业调查，因而当地大多数渔民都认识他，并且对他很了解，在这些渔民中有不少人是八路军。当时，老解放区物资缺乏，特别是药品、煤油、火柴以及其它军需用品等更是紧张。共产党员郑少臣来津与郑恩绶接触，秘密研究如何购进上述物品并将其运出天津。经商量决定：利用郑恩绶在水产界的威望，以经营渔栈为名，用活鱼船、假舱底，多次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往解放区。

由于郑恩绶上述一系列的活动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确定

为共产党嫌疑分子（敌伪档案中有记载），处处受到监视，处境极为危险，幸而很快天津就解放了，始免于难。因此，解放后他感到无比喜悦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经常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教育子女和青年一代。

（二）

当年郑恩绶从日本回国后，主要从事水产教学工作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坐落在天津北站外的河北水产专科学校。为实现振兴中国水产事业的夙愿，郑恩绶到该校任教，并负责全校的教务工作。当时的善后救济总署华北渔业督导处在天津成立，他被聘为该处技正。

1949年天津解放后，郑恩绶继续留在河北水产专科学校，负责教学工作，他干劲十足，以培养水产人才为己任。1953年院系调整，该校撤销，郑恩绶感到非常惋惜，但很不甘心，他对人说：“非搞一个水产学院不可。”所以当1959年天津建水产学院时，他便高兴地从水产部来到天津水产学院担任副院长。当时他已年过花甲，曾有人劝他留在水产部，以免事务缠身，学院筹备伊始，百废待兴，恐不能胜任繁巨。他却说，我这个人就是闲不住，我要把学院搞起来，在有生之年，再为国家多培养一些水产人才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

郑恩绶既对水产科学理论有很深的造诣，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。他办学绝不只是讲书本知识，更注重实践。他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亲自带领学生上船出海实习。水产专科学校的学制为两年，在短短的两年中，除课堂教学以外，要组织两三次实习，如组织学生到白洋淀一带搞调查研究，上渔轮劳动，去烟台外海、黄海远洋航海等，实

习后还带回来不少标本。

他讲课深入浅出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比如他讲到捕捞工具，总是先让大家看实物，然后组织讨论，研究这些网具是否适应外海捕捞，应如何改进。他讲课从不生搬硬套，而是启发诱导。一次，他为渔捞班、加工班的学生业余讲大课，先在黑板上写“海女”、“海鬼”两个词，然后分别介绍日本采珠业和我国潜水员的情况。原来日本采珠业，雇用年轻妇女潜水采珍珠，因为她们肺活量大，适于潜水作业，被人称做“海女”。而“海鬼”是中国一位潜水员的绰号，他能在海底潜水50分钟之久。他向学生讲河蟹，风趣地说“七上八下”，即河蟹每年旧历七月进入海河，逆流而上，到八月又顺流而下入海，然后在海淡水交界处交配。河蟹交配时雌雄互相拥抱，有如跳交际舞一样，产卵后很快便死去，转年生出小蟹，再进入海河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年复一年。他评价蟹的好坏也很简单、明确，说蟹之上品，其肉味甜，其刺硬，次品的味臊，其刺软。

由于郑恩绶在教学中认真贯彻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，学生毕业后，走上生产岗位，能很快地把工作拿起来。据河北省水产局安承回忆：自己刚参加工作时，一次随船出海去日本，遇上了台风。因为在校时常出海实习，所以并不怵头，而且还能配合大副、二副，掌舵看图，测算船位，可谓应付裕如。现在华北各省以及辽宁、黑龙江年在50岁左右的从事水产科研和管理人员的骨干，大都是郑老的学生。史耀昆回忆：在校实习，有一次去远洋航海，乘的是香港的一艘船，挂巴拿马国旗，船上大副、二副都是水产学校前期毕业生，工作得极为出色。在国家水产部工作的郑老的学生也不少，堪称桃李满天下。

(三)

郑老对水产科研的贡献，主要也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。对有书本知识的人，如当时水产部的贝类专家张奇等等，郑老也极为佩服，但郑老的贡献，主要却不在这方面，他的遗著纯理论性的也不多。他多年来在我国所有海域从事捕捞实践，对航海、渔船性能、捕捞网具和各种鱼类都有深邃的知识。

建国初期，北方渔场恢复很快，而南海海域开展却较慢。郑恩绶为了摸清中国南海水产资源和渔场情况，不辞劳苦，不畏艰险，经常出海与渔民、渔工共同劳动，共同研究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，终于在白马井打开局面，为开发南海渔场，加强国防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撰写的《北部湾中国渔场概况》、《刺参增殖试验的初步总结》等著作，具有国际水平。其学术造诣，不仅在国内，而且在国外也有很高的声望。

郑老在河北省工作期间，搞机帆船捕捞，事先在渤海湾测出渔场情况，出海前他先向船队人员讲水产资源与渔场变动情况，然后出海捕捞，一般每网可得数千斤，多的三四万斤。河北省的海洋渔业是他花了很大力气，靠4条船起家搞起来的。1954年，每条船只配备一台收音机，1956年又配上收发报机，这样由少到多，由小到大逐步建立起来。

50年代初，对秋季的虾钱是否就是次年春天的对虾有争论，有人持否定态度。对此，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，并与日本同行通信进行探讨。最后确定：虾钱是对虾的前身。还有历来秋伏不作业，他却主张这一时期可以在渤海湾拉虾，认为只要捕捞方法、网具设备解决得好，不会造成资源枯竭，于是这一禁区被打破了，并取得良好效果。为改变我国渔业生产的落

后面貌，他曾乘渔联社船只去苏联进行学习考察。到达后，得到有关渔业组织的帮助，参观学习了海洋捕捞、造船、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加工等技术，并得到对方赠给的部分水产资料。在那里逗留期间，还和他们的渔业组织人员、渔民们合影留念，回国后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，不幸于“文革”中遗失。

1956年，中、苏、朝、越、泰5国渔业会议时，郑老与苏联水产专家在南海比武。苏方用一周时间捕到1000多斤鱼，我们拉了两网，船就装不下了。郑老很高兴，和同志们共同庆祝，事后还请全家人吃饭。他总结这次获胜的原因说，苏联的捕捞设备比我们先进，可是对渔情了解不够，我们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，对渔情掌握准确，所以胜了他们。

同年，日本渔业代表团来中国访问，进行渔业科学技术交流和中日渔业合作开发水产资源，繁殖保护、培育新品种、养殖等问题会谈。当时郑老以水产专家身份会见了日方代表团，由于可以与日本人直接对话，会谈进行的非常顺利，到得日方代表的称赞。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后，亲自召见了郑恩绶，赞扬他这次会谈成功，并鼓励他今后要为我国水产事业多出些主意，多培养些人才。郑恩绶同周总理谈到自己当年在日本上学的情况，汇报了我国水产事业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今后如何发展中国的水产事业的建议，周总理听后非常满意，以后于1958年、1962年先后听取了郑恩绶汇报有关“我国目前水产事业状况”和“如何发展水产事业”的个人意见。

1962年春汛，下边反映，大沽口外渔场的黄花鱼旺发。为了更多地供应天津群众吃鱼，我和郑老商量，请他到海上亲自指挥，打好这一仗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于是以他为首组织了一个指挥班子，随天津海洋捕捞公司的渔轮出海，到捕捞第一线

指挥国营、集体渔业船只捕鱼。他先测出渤海湾资源与渔场变动情况，渔场的实际情况比原来了解的还要好，真是水有多深，鱼有多深，从上到下，群情激奋，一对渔船出去，一两天就满载而归。这一战役持续了五六天，共捕获黄花鱼 385 万斤。当时正值 3 年灾荒，五一节临近，而副食供应紧张，这次捕捞丰收使人民群众高兴地吃上了新鲜的黄花鱼。

郑恩绶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、水产专家，受到各方面的尊重，但他平易近人，谦虚谨慎。在任天津水产局副局长期间，每天上下班都有车接送。为不脱离群众，他坚决不让车开到家门口，他家门临河，他叫车在河对岸停下，自己步行出门和回家。他生活不富裕，但邻里生活有困难时，他总是竭力相助。邻里间发生争吵，他必出面调解。由于他平时群众关系好，威信高，经他出面，问题都能顺利解决。

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水产教育工作，每月都要拿出一半薪金贴补生活困难的学生。受到资助的学生前后达 30 多人。现在秦皇岛渔业公司工作的张珊珍，当年无力继续求学，郑恩绶就将他的学费和每月生活费全部承担下来，直到他学习期满结业。另外，同学们做实验，他也出钱帮助。据现在天津市水产局工作的安福春回忆，有一次他们做实验没有福尔马林，郑就拿出钱让学生去买。

我与郑老在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，和睦相处，亲密无间，合作共事，赤诚相见，彼此从思想上分不出党与非党的界限。我原来对水产工作是外行，懂得很少，因此经常虚心向他求教，他总是循循善诱，加以指点。他见我常深入实际，随船出海，边工作边学习，更有了共同语言。我常与他在一起研究水产政策、生产经营情况，获益良多。

本来，他平日身体很好，很健康，蛮可以享高年，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，为水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，不幸十年动乱中，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。他当时被诬陷为“蒋匪派遣的上将级特务”，精神上、肉体上受尽折磨，一个胳膊被打断，5根肋骨被打折、塌陷，影响、压迫内脏。尽管如此，他始终未屈服，还给造反派写信：“你们认为是特务的，和我都很要好，……你们这样做不对。”表现了一个多年受党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，临危不惧、宁死不屈、坚持正义、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。

黑白女子篮球队

1931年，天津篮坛出现了一支私人女子篮球队——黑白女子篮球队，队员大多是来自南开、耀华、圣功等中学的在校学生，其中有：邓婉珠、唐绣华、郑慰瑚、张美和、唐少梅、林秀莲、陈乃俊及靳淑荃等人，指导为何步运和徐兆熊。队员们主要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练习，无论严冬酷暑都坚持训练，她们还经常去观摩篮球比赛。在假期，每周都有篮球友谊赛，在比赛中向友队学习，取长补短。这支球队技、战术日臻成熟，成为天津女篮劲旅，主要功绩在于指导能发现每个队员的特点，因人施教，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。靳淑荃、张美和、陈乃俊、林秀莲、邓婉珠等曾作为河北省代表队先后参加了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运动会、1934年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及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运动会。在南京运动会上，上海队一举夺冠，亚军为广东队，河北队与北平队并列第3名。1936年以后，天津市广泛开展中学生篮球赛，黑白队队员们均回本校代表校队参加比赛，都成了本校校队的骨干，使天津女子篮球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
林秀莲 靳淑荃

著名教育家潘承孝教授

王 家 琦

潘承孝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务院于1952年批准的第一批国家一级教授，其亲传弟子们，如史绍熙教授、胡国栋教授等，称他永言老师；河北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，多称他潘院长；更多的人们则尊称他潘老。称潘老，与其说是出于礼貌，勿宁说是出于由衷的敬佩心情。我与潘老并非师生关系，只是作为河北工学院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，与其相识相处近30年，尤其近几年来，才认识了潘老，认识了这位老人的品格气度和人生追求：其品格气度——“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；其人生追求——以教育为事业，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。潘老从教60余年，育得桃李天下，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，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。如今，他虽已93岁高龄，又因尿道结石而术后人工排尿，可是，只要不去外地开会，仍然每天来到办公室，热情地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：有的问教疑难，有的请其校阅文稿，有的探询历史，有的倾诉心声……无一拒之门外；同时，他还尽着人民代表的职责，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将自己调查了解到的情况、问题，主动积极地反映给有关领导部门。在他90大寿暨从教60年之际，曾有人写诗赞美他：伏枥老骥仍奋蹄，不坠青云耄耋年。

一、身世及学生时代

潘承孝，字永言，1897年生于江苏吴县（今之江苏省苏州市）的一个地方望族之家。在其出生之前，即按族规取名承孝，嗣续其已故伯父潘志愉；出生后三天，即由嗣母（本为伯母）抚养。嗣母一家3口（尚有一姐），赖嗣母陪嫁的中药铺为生，虽无冻馁之虞，然收入微薄，家境比较清寒。及至入学年龄，便在潘氏“义庄”（旧时封建大家族为加强宗法统治秩序而设立的田庄）兴办的松麟小学堂读书；1911年于吴县公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毕业后，考入东吴中学。

是年，辛亥革命将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大清帝国彻底摧毁，这一改朝换代的大事，震撼着神州大地。消息传进了这位刚跨进中学门的少年的耳朵里，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共同驱使，他想到自13世纪以来就成为封建统治中心的大都——北京，去开阔眼界，增长知识。其嗣母是位有教养的大家闺秀，也认为应该让孩子走出吴县这个小天地去磨炼磨炼。他的生父潘志禧，早年曾留学日本，眼界更为广阔，思想也很开明，支持孩子的想法，并担负他的生活费用，使之于1912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。

1915年初，已经取得终身大总统头衔的袁世凯，蓄谋恢复帝制，竟丧心病狂地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致全国舆论哗然。北京各界，首先是知识界众说纷纭，但有一条却是共同的想法——“二十一条”成立，中国必亡。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泱泱大国，竟遭受一个只相当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的欺凌。这现实，引起了这位中学生的思索。他感觉到：中国地大物博，是大而穷，人口众多，是多

而弱。工业不发达，造不出现代工具和武器，用长矛大刀，是抵御不住洋枪大炮的。欲救贫弱中国，必须有发达的工业。于是，他下决心要学习工业技术以报效祖国。1915年暑假，中学尚未毕业（当时的中学为4年制），便以优良的成绩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，在机械系学习机车工程。经过预科两年、本科4年的学习，1921年暑假以机械工程学系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，并获得学士学位。

大学毕业，他面临两种选择：就业——家有高堂老母，且家境清寒，赚钱养家糊口，人之常情，事实上，他毕业时，交通部已经分配他到青岛东方机车厂任练习工程师，月薪百余大洋，收入颇丰；深造——可以官费留学美国，因为按当时北洋政府的规定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（1921年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等合并为交通大学）各系毕业生的第一名，可以不经考试官费留学，而且，这个学校同清华大学、北洋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一样，毕业生的学历、学位是得到美国各名牌大学，如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、康乃尔大学、威斯康辛大学等承认的，不经考试，便可直接进入这些大学的硕士院攻读学位。这位年轻人志在事业，毅然决定出国深造，以实现“工业救国”的抱负。

二、留学美国，志在求知

大学毕业，他决定留学美国。‘出国前，当时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的美籍教授E·G·Yaung诚挚地给他临别赠言，说：“你们中国人科举思想太重，出国留学，常常是得个学位就回来了，即俗话说说的‘镀镀金’，并不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，这样做是很不好的。希望你到美国后，多学点在中国无法学到的东西，多看点在中国见不到的大工业。你们中国的大学所用的

教科书大多是美国的，如果只是读书，又何必到美国去呢！希望你最好是读一年书，到有关工厂去工作一年，看到有什么不懂的东西，再回到学校读一年书。这样学，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。”他接受了E·G·Yaung教授的好意，真的这样做了。1922年7月，他到美国后，觉得在“唐校”所学的机车工程专业面太窄，便决定改学动力专业，并没有走“捷径”直接攻读硕士学位，而是自愿进入康奈尔大学机械系动力专业4年级，学习在国内未曾学过的内燃机、汽车和机械工程实验等课程，以巩固基础知识并拓宽知识面。一年后毕业，便到著名的阿列斯——查尔米汽车工厂实习了一年。在实习过程中，他看到该厂热处理工艺过程，自己一窍不通，于是1924年8月他进入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生院时，便选定以动力学为主题，以金相热处理为副题攻读硕士学位。只用了一年时间，便于1925年暑假通过答辩，获得硕士学位。接着，他又到赫普汽车厂实习，同时，还争取时机到全美有名的各大工厂参观了一番，以广见闻。

他在美国留学4年多，基础知识学得扎实，实践知识积累得丰富。

三、从工业救国到教育救国

1927年2月，他由美返回中国。由于他是官费留学生，按当时北洋政府的有关规定，须到设在天津的直隶省交通署报到，等候任用。可是时值军阀混战的大动乱的年月，百业凋零，民不聊生，军阀当局忙于内战，哪里还顾及什么发展工业，振兴中华？！对于他这位学成回国的青年学子，根本无暇过问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一个热血青年“工业救国”的抱负和激情，遭

到当头棒喝。他苦闷、徬徨情不自禁地反思：祖国贫穷落后，屡遭帝国主义列强凌辱，有限的人力物力，不去抵御外侮，反而打内战自相残杀，岂不是使帝国主义者坐收渔利？！究其原委，源于愚昧无知。于是他便产生了开发民智，为国育才、储才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念头。

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正当他报国无门之际，他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时的同学、当时正在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（即今河北工学院的前身）担任机械专科主任的刘金声（字问凯），邀他到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去代课，他便慨然应允了，从此，他开始走上高等工业教育的讲坛，成了他投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契机。

可是，他在校代课刚刚3个月，新旧军阀的战争又起，殃及天津。1927年6月的一天上午，他乘人力车去学校讲课，路上遇到一位教师告诉他，学校被军队占用了，已经被迫停课，他只好快快地回到寓所。转天，他得知学校无限期地停课，便经郑世魁教授介绍，8月去了沈阳，受聘于私立冯庸大学，任机械系教授。在冯庸大学，他与新结识的留美电机硕士刘锡瑛教授同住一室，生活上相互照顾，学术上相互切磋，亲密无间，交谊甚笃。校长冯庸很器重他们这样的既年轻、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，给他们很优厚的待遇。可是，潘承孝对冯庸组织学生协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作战，颇为不满，因而，不接受冯庸的续聘。1929年8月，他离开冯庸大学，受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之聘，任机械工程学系教授。刘锡瑛亦因同一缘由辞去冯庸大学职务，应聘东北大学电机系教授。这二位年轻教授，不仅人品性格合得来，而且志趣相近。对于教育工作，不仅仅当作谋生手段，而是作为强国富民的事业来对待，把全部精力